

中美慈善文化比较及其现代启示

彭红, 齐辉^①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推力是其罪富文化、互济文化和个人主义, 中国式慈善与其特有的仇富文化、救急文化和父爱主义密切相关。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须扬弃传统慈善文化资源, 吸收西方先进的慈善文化元素, 培育公民社会, 营造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

[关键词] 慈善; 罪富文化; 互济文化; 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6-0017-03

慈善彰显着人性之美, 慈善事业发展衡量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中美两国在慈善事业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究其根源在于两国各具特色的慈善文化。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 行为由制度决定, 而文化决定制度。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推力是其罪富文化、互济文化和个人主义, 中国式慈善与其特有的仇富文化、救急文化和父爱主义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慈善生态发展呈现出好势头, 明星慈善、网络慈善等逐渐出现。虽然文化不能移植, 制度不能复制, 但厘清中美两国慈善文化的不同源流, 有助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一 罪富文化与仇富文化

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推力之一是其罪富文化。当今多元化时代, 美国仍然有约80%的人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教义中有罪富说, 即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耶稣说: “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 唯一的途径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捐赠给社会。罪富说浸润到美国人的骨子里, 潜存在其文化血脉之中。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开创者、钢铁大王卡耐基指出: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石油巨子小洛克菲勒从小笃信基督教, 他的名言“尽其所能获取, 尽其所有给与”成了美国历代富人的座右铭。罪富说培养了美国富人的敬畏心理, 使他们不致于滥用财富, 挥霍金钱, 从而孕育发达的捐赠文化。据统计, 美国富人每年的慈善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 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1]。基金会是其慈善事业的主要运作方式, 所谓慈善基金会, 就是“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事业的合法社会组织”, 主要资助教科文卫和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是美国政府与社会“沉默的伙伴”。小洛克菲勒在去世前将绝大部分财富捐赠出来, 1913年成立

洛克菲勒基金会, 其在中国的善举是1916年在北京创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 在美国则创立了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等, 青霉素发明就是其资助成果之一。再者, 美国私人捐赠的80%为个人捐款, 20%才是公司和基金会^[1]。可见, 慈善不仅仅是富豪们的义举, 普通民众也是慈善事业的主体。

仇富文化是中国慈善生态脆弱的原因之一。中国道家有“损有余以补不足”的思想。仇富文化的表现一是均贫富的历史惯性积淀而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结, 二是对劫富济贫式英雄的道德推崇。仇富文化的成因一是我国古代小农经济为主导的抑商贱商思想, 商人为四民之末, 《管子》载: “士农工商四民者, 国之石民也。”二是因为有些财富确系不义之财, 或出自权力寻租, 或破坏了市场公平原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 中国民间巨富大多来自于“裙带资本主义”, 是权利资本化的结果。但仇富不仇袁隆平, 人们并不仇视合法之富。三是源于历史和现实中的“为富不仁”现象。《孟子·滕文公上》载: “阳虎曰: ‘为富不仁矣, 为仁不富矣。’”杜甫诗云: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尽管历史上不乏为富而仁者, 如浙江杭州“江南药王”胡雪岩广施善缘, 创办庆余堂药店开展义诊。但更多的富豪挥金如土, 却难有善举。四是“东方式嫉妒”使然。俗称红眼病。“你行, 我也行。”这是西方式嫉妒; “你行, 我叫你不行。”这是东方式嫉妒。因为嫉妒, 所以“明是一盆火, 脚下使绊子”。培根说: “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从自己身边升上去的人。”你富余而我不足, “是可忍, 孰不可忍”。于是仇富、劫富甚至杀富。正因为仇富文化, 财富的安全性脆弱, 所以藏富、炫富, 富豪捐赠难成气候, 慈善生态脆弱。

[收稿日期] 2011-10-28

[作者简介] 彭红(1969-), 女, 湖南衡阳人, 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①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二 互济文化与救急文化

美国慈善事业发达的另一推力是其互济文化。互济文化最早源于基督教教义,《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博爱、利他、同情和济世的话语:如“要爱人如己”、“给予比接受更为有福”。其“普世”思想使教会一直将扶贫济困视为己任,经常举行慈善活动,教徒则以平常心行善,把公益捐助当成是日常生活要素,是维护自己的人权和获得精神寄托。现代权利理论告诉我们,人权有实证权利和道德权利两种,关心人爱护人也是人权的一种,是人的一种道德权利,人们在行使这种道德权利的过程中能获得精神满足和人格成长^[2]。互济文化后来是源于一种新教理念: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即在法律意义上财富是私人所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卡耐基指出,处置多余财富,让其真正有益于社会是一种智慧,花钱需要的智慧与赚钱需要的智慧同样重要。互济文化的形成三是源于美国特殊的建国历史。众所周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美国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独立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既无税收亦无财产,为经费不得不发行大量债券,战争结束后,政府破产,只能向民间借债,更无从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这样迫使美国人不得不组织起来,成立社区,组织社团,彼此互济互助,实行社会自治,从而形成互济文化传统。互济文化的表现一是社区文化发达,社团众多。二是义工服务踊跃。

中国慈善事业的特征与其救急文化密切相关。所谓救急不救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 2008 年 5·12 汶川和 2010 年 4·14 青海玉树抗震救灾中,中国人的慈善情怀充分表达,从政府到商界,从草根到明星,人们踊跃捐款捐物,大批志愿者亲赴一线。这说明中国人慷慨救急,也说明国人的捐助多是因灾而捐,有难才捐,是捐赠的非常态化,这是典型的救急文化的表现。据史书记载,中国是无灾不成年,但多难兴邦,中国人很有忧患意识,救急文化也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储粮备荒思想。《礼记·王制》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所以西周就出现仓储赈灾制度,以备凶年之救急。救急文化还源于儒家的仁爱伦理思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国人注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孟子的“仁政”思想中也有“救急穷人”的内容。晚清时期坚持民间救灾的江浙商人经元善强调:救人之荒可免己之荒。救急文化亦可追溯到中华民族患难相恤、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和地缘政治发达,乡规民约对规范民间秩序意义重大。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中有“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的内容。当然,中国救急文化也与佛教救苦救难的教义相关,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见死不救是佛门大忌讳。

三 个人主义与父爱主义

美国慈善事业发达的又一推力是其个人主义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培育了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与平等,其强调个人优先于政府,个人高于政府。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政府的本能的不信任感。

美国政治伦理的人性假设是“人性本恶”,为政者也不例外。并且权力有自我扩张的本性,所谓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因而对权力的制约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种政治理念形成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美国人看来,政府并不会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在慈善事业上也如此。美国人怀疑政府的公共慈善事业存在低效率和腐败现象,因此,更愿意投身私人慈善事业。二是个人责任感。个人主义一方面强调社会和共同体要尊重个人价值,尊重个人权利,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人对社会、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个人主义在 19 世纪早期给美国社会注入极大的活力。因为人人都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实用主义哲学之父爱默生将个人主义提炼成美国精神、美国文化。其个人主义思想有四点:一是个人的神圣性。神圣的个人不允许受到任何人的侵犯,哪怕是他的家庭成员。二是个人的特殊性即个性。个性便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无论何种情况,他都不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去迎合社会。三是个人的无限潜力。四是个人的自治权。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必须对自己的状况负全部的责任^[3]。个人主义的表现一是美国人崇尚个人奋斗,年轻一代要自我创造,而以“啃老”为耻辱。因此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二是美国第三部门发展良好。第三部门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主要有 NGO(非政府组织)和 NPO(非营利组织)。其根本特征是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在个人主义的文化视野中,慈善捐赠是优秀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自秦朝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几千年的宗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政治伦理表现为家天下,即所谓家国一体,家国同构。伦理规范首要的便是忠和孝,其官本位的儒家思想形成浓郁的父爱主义传统。父爱主义(Paternalism)又称家长主义。父爱主义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提出的理论,他将带有“善意”和“强制”规定的法律都归结为父爱主义。父爱主义是舶来语,但其基本精神却很契合中国文化。从社会心理来看,中国人对政府对为官者有天然的信任甚至崇拜,认为政府万能或者政府应该万能,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同时,中国人内心习惯于作为子民而向往父母官为其做主。追求铁饭碗现象和近年来的国考热正说明了这种社会心理和官本位文化。从社会结构来看,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强势政府主导的二元社会架构,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质是政府全能,而作为第二部门的企业发展受到政府的挤压,第三部门根本没有生存空间。而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出于家长般的善意心态对企业和第三部门监管,正所谓“管你,是为你好”,还是政府主导的二元社会架构,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难以完全独立,第三部门的成长更是受限,公益慈善官办色彩浓厚。从古到今,我国每次重大的救灾赈荒活动都是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就像一家之主,大包大揽,把本该社会或者民间办的事情一手包办。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指出的:“在中国则是官办的慈善事业,中国被称为充满着父爱主义的国家,官吏被称为父母官,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救灾济贫一向被认为是官

方应该承担的一项职责。”^[4]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路径多是自上而下的,基金会大多脱胎于政府部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办的,儿童少年基金会是全国妇联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直属国务院扶贫办。公益慈善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于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其存在意义在于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官办慈善自然不伦不类,今年的郭美美事件等就是官办慈善遭遇尴尬和面临危机。

四 中美慈善文化比较的现代启示

(一)扬弃我国传统慈善文化资源

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同样,一个民族慈善文化的演进也不能完全超越传统与历史。因此,我们在培育与建设我国现代慈善文化时,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慈善文化的传统源流。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儒家的仁爱伦理思想,道家和佛教的善恶报应观念,以及几千年来民间和政府的慈善活动,积淀成我们民族特色的传统慈善文化。但是,传统有时也表现为一种惰性。我国传统文化中其实缺乏现代慈善观念和公益基因。传统施恩仅表现为零星的、偶然的和随机的事件,真正纯粹民间的公益慈善活动并不发达。而现代慈善事业是由专业的慈善组织策划和实施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规范的和经常性的社会事业。从传统施恩向现代慈善过渡,这是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国人亟需转变观念,培育现代慈善文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慈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抛弃我国传统文化中亲疏远近的慈善原则和施舍图回报观念,树立公益慈善观,每一个公民都把对弱势群体的帮助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形成全社会互济互助的文化氛围。

(二)吸收西方先进的慈善文化元素

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利他主义是慈善文化的核心,但西方基于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的互惠主义更适合我国国情,互惠主义是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慈善文化价值观。再者,西方以“自愿、非酬和利他”为三要素的志愿精神,是民间组织发展的原动力,我们要大力吸收和广泛传播志愿精神,发展民间组织,激励国人的义工服务。其三,推崇公民的给予的自由。给予不只是一种义务,更是公民的权利。关心人爱护人是人的一种道德权利,人们在行使这种道德权利的过程中能获得精神满足和人格成长。

(三)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相对分离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而自主、多元与开放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培育公民社会,既是社会自治的前提,也是社会自治的表现。真正的公民社会,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应该有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即民间组织的发展,第三部门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实现社会自救和公民互助,特别是救助边缘人群,从而有效克服公民的原子化生存困境,防止洛阳性奴案悲剧重演。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立法完善,减少对第三部门的限制与干预,形成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同时,民间组织自身要加强自律监督,坚持公开透明,提高社会公信力,可借鉴西方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企业化治理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营造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

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吸纳和整合社会资源,以促进社会公平,公益慈善事业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发展慈善事业可以化解社会危机,作为第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首先,我们要发展学校、社会和网络慈善文化教育,加强慈善文化学术研究,传播公益慈善文化,营造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其次,加快慈善立法和制度建设,促进民间慈善组织自治,防止其蜕变为第二政府。再次,政府的财税政策要进行调整,以更好地激励企业和富豪捐赠,从制度文化层面促成为富而仁。最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企业慈善文化传播发展。

总之,和谐社会呼唤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厘清中美两国慈善文化的不同源流,有助于正确认识我国慈善生态的地位和特征,从而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 团. 公司慈善文化与政策培育[J]. 湖南社会科学, 2006(2):82-89.
- [2] 彭 红. 我国明星慈善文化兴起的原因探析[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33-35.
- [3] 刘宽红. 美国个人主义思想探源[J]. 学术论坛, 2006(12):11-14.
- [4] 郑功成. 中华慈善事业[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9.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harity Culture of Chinese with the U · S and Its Modern Enlightenment

PENG Hong, QI Hu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One thrust of charity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U · S is the culture that the rich is a sin, another is the aiding each other culture, the third is individualism. Unique Chinese charity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culture of hating the rich, emergency culture and paternalis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charity must discard the traditional charity culture resources, absorb western advanced charity culture elements, cultivate civil society, and build up charity culture atmosphere.

Key words: charity; the culture that rich is sin; aiding each other culture; individualism